

新时代美学译丛 / 丛书主编 高建平 张云鹏



弗洛伊德的美学

心理分析与艺术研究

[美] 杰克·斯佩克特 / 著

高建平 /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HENAN UNIVERSITY PRESS

非外借

The Aesthetics of Freud:
弗洛伊德的美学

A Stu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Art
——心理分析与艺术研究

[美]杰克·斯佩克特 著
高建平 译

河南大学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弗洛伊德的美学:心理分析与艺术研究/(美)斯佩克特著;
高建平译. —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9

ISBN 978-7-5649-1660-2

I. ①弗… II. ①斯… ②高… III. ①弗洛伊德,S. (1856~
1939)—美学—研究 IV. ①B83—0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98946 号

责任编辑 屈琳玉
责任校对 王阿静
封面设计 马 龙

出版发行 河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商务外环中华大厦 2401 号

邮编:450046

电话:0371-86059701(营销部)

网址:www.hupress.com

排 版 郑州市今日文教印制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南瑞之光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60 千字

定 价 6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河南大学出版社
营销部联系调换)

总 序

我想组织一个译丛，翻译与我们生活在同一时代的国外美学家的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我大都认识，常在一起开会、聊天、讨论。这些交流、交心，甚至交锋的经验，常常很愉快，我也愿拿来与学界的朋友分享。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中，中国美学界出现了三代翻译人。对美学翻译工作做出巨大贡献的朱光潜、缪灵珠、宗白华等那一代人，把翻译的重点放在西方古典美学论著上。在他们的努力下，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歌德、黑格尔等人的许多重要美学著作被译成了中文，中国人关于西方美学的知识体系开始形成。我们要深深地感谢他们。没有他们，美学在中国的情况，就会大不相同。

从 80 年代初起，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下，一些新的翻译开始出现。这些翻译有走向现代的倾向。一些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的重要美学著作被翻译出来。在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是李泽厚主持的“美学译文丛书”。这套丛书收入了像鲁道夫·阿恩海姆、克莱夫·贝尔、苏珊·朗格，以及乔治·卢卡奇、列·斯托洛维奇等人的 20 世纪前期和中期的作品，将我们的美学视野引领到了 20 世纪的前期和中期。80 年代初，出现了“美学热”，但如果只有美学的热情，只是关起门来狂想，那么，只会一人一个大体系，出现

美学的怪胎。那是创造力的空耗。在当时，翻译、思考、对话，是美学健康发展的必经之途。

到了90年代后期，中外美学交流又翻开了新的一页。这具体的表现在，中国美学家走向了世界，与国际美学界有了直接的交往。越来越多的中国美学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进行越来越深入的交流。同时，在中国，也组织了各种形式的国际美学会议，小到几个人、几十个人的对话会，大到近千人的世界美学大会。不少中国美学家开始走遍世界寻找美的真谛，而对于一些世界知名的美学家来说，中国也成了他们常来常往，启发学术灵感的地方。

一些学界的前辈曾经在一种普世主义的思想影响下，通过翻译来学习美学知识，从而形成我们的知识体系。他们也曾经提出，与其凭空想象大体系，不如多多翻译。今天，许多人对此诟病，仿佛翻译、介绍和引进成了罪过。对此，我是不能同意的。我们感谢这些学界的前辈，正是由于他们，现代中国的美学才建立起来。我要毫不犹豫地说，我们是他们的学生，我们正是读了他们的书才走上美学道路的。对他们的一些想法和做法，要放到那个时代中来思考和理解。

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学问，一个时代也有一个时代对西方美学的看法。通过翻译建立交流关系，与作为交流的结果而进一步推动的翻译，味道是不一样的。一种美学，是在一种语境中产生的，目的是解决出现在这个语境之中的问题。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不同时代，以及不同的艺术和生活状况，都形成了不同的美学语境，这些都是产生不同美学观的土壤。过去我们将一些美学观看成是普世性的，是就这些美学思想本身

看,从中寻找具有普世性因素。现在,当我们能够有条件进一步直接了解这些美学语境和土壤时,就能够不再仅仅是选择性地从中挑出一些东西接受,而是在对这些美学思想有了进一步深入了解后,再进行思考。

我曾经提出一种观点:没有共同的美学,但有共同的美学的发展。我的意思是,不同民族和文化,都有自身的美学观。但美学家们之间要交流,相互学习,相互启发,从而使美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这就需要翻译,更多地了解国外,更多地思考自身,建立既是当代的,又是中国的美学。

今天,我们与国外同行之间,有着许多共同的话题。例如,美学由于20世纪后期的社会大转型而变成热门学科,又由于文化研究热而受到冲击,面对这些发展,全世界的学者都在思考怎么办。我们与国外同行也都面临着共同的任务:美学学科本身被消解,出现了普遍的走出康德式的美学潮流,分析美学也出现了重重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重建美学?不同国家的美学家们,背负着不同的文化传统,哲学背景,面临着不同的社会状况,因此,也有着不同的做美学的方式。但同时,一些普遍的,从属于我们这个大时代的问题,从属于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所必然面对的一些问题,还是共同的。这时,美学家们更有相互交流的必要性。这时,翻译也就显得更为重要。当然,国外同行的书对我们的意义,只是启发,也只能是启发。我们要在吸取他们的思想的同时,建立和发展我们自己的美学。

在当代社会,美学还有什么用?面对唱衰美学的鼓噪,我还是坚持,美学是有着重要的作用的。我们需要美学来改造我们的社会,改造我们的生活。大家都在努力,要实现中国梦。什么是

中国梦呢？我们要有更富裕的生活，更有尊严的生活，这都很重要，但除此之外，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我们还需要更有品味的生活。美学应该在这方面做出一点贡献。

高建平
2014年3月

译者序

本书从1986年开始选译,至今已经有30多年。2005年曾修改过一次,纠正了不少错误。这次再印,抽空看译稿,又作了不少修改。翻译总是这样,永远有不尽如人意之处,只是尽可能使错误少一点而已。

弗洛伊德的美学在当代的意义,已经无须我多说。他引领人们发现了无意识,发现了心理动力机制,从而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人、研究人的心理的路径。这一功绩是伟大的。今天,他的一些具体结论受到人们的质疑。如果这些质疑是从科学的角度出发的,那应该值得重视。任何一种理论都总是在被批判和被修正的过程中被继承和发展的。如果这些质疑只是从日常道德出发的,那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弗洛伊德与这些质疑者说的,是不同的东西。不管怎么说,弗洛伊德引领人们进入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后来的研究者会从他那里受益。

前几年,我曾去维也纳访问弗洛伊德故居。弗洛伊德已经在他逝世前一年,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移居伦敦。他的藏书和藏品,也大都搬走。我在那里仅看到几件遗留下来的物件。其中最使我印象深刻的,是《格拉迪瓦》。对此,本书有详细的论述。一件小小的、不引人注目的泥版,竟发掘出那么多的故事,这给了我

们很好的弗洛伊德式学术研究的示范。

感谢河南大学出版社有兴趣重印此书。书有自己的命运。如果这本书还能找到更多的读者,还能成为更多的人通向弗洛伊德美学的钥匙,那会使我感到欣慰,说明我当年所下的功夫没有白费。

当然,今天,弗洛伊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即使对于专职心理分析师来说,弗洛伊德留下的文字,也已经是太古老了。一位思想界的巨人,也许不能领风骚五百年,但也不仅仅是三五年。我想,三五十年是可能的。弗洛伊德的思想属于20世纪的前叶和中叶。我曾经提到过一个美学时间问题:各种社会和思想因素的综合影响,构成美学上的一代人。他们有相似的审美趣味,相似的艺术追求和价值标准。当美学上的一代人过去时,一切都会改变。

那么,在这以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然,任何人的时代都会过去。但我还是想再次重申这一点:人文学科与科技不同。正像柏拉图的书不会过时,孔子的书不会过时,弗洛伊德的思想也说不上过时。阅读、思考、批判,这是学问之道,也是学术创新之道。阅读,是说他所提出的一些观念和模式绕不过;思考,是说要向前进;批判,是说从中寻找有益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弗洛伊德的美学已是我们的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2014年10月1日

中译本作者序

1. 弗洛伊德的美学概述^①

为心理分析和其他的西方思想在丰富而发展着的现代中国之中确定位置(既包括实际的,也包括潜在的位置),是一件既复杂又富于挑战性的工作。这一专门的关于弗洛伊德美学的论题,提供了特别的兴趣和困难。这正是我的这篇《弗洛伊德的美学》第三版序言所要阐述的内容。一旦我们将在中国所流行的美学思想与中国学者接触很少的、作为心理分析与心理治疗家的弗洛伊德的美学思想作比较,困难就立刻出现了。与中国人重视美的规范与整体的和谐相比,弗洛伊德所重视的不是形式问题,而是病理学,关注那些能显示无意识动机和暴露被压抑内容的细节。弗洛伊德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从他所受到的丰富而多方面的教育里汲取了大量的东西,这种教育包括古代与现代文学。正是从这

^① 我愿在此对为此书中文版的翻译和出版作出贡献的我的朋友、中国美学家高建平表示谢意,他的英文著作,以及他与我的谈话,对我有重要的激发和启迪作用。2002年10月,北京“美学与文化:东方与西方”会议的中国与西方的参会者,以及我在罗杰斯的同事安杰拉·霍华德扩展和深化了我对中国美学的理解。我的妻子黑尔佳对我的研究所给予的深沉的微笑,对我总是警醒和挑战。

种教育中,他获得了俄狄浦斯情结、自我与伊德等大量的术语。近来的心理分析理论家们在关注艺术时,通常忽视在这些对弗洛伊德早期研究中所具有的个人表现,这一点我等一会儿还会提到。^①

弗洛伊德在七八岁时很喜欢菲利浦森《以色列圣经》(1858、1859)的插图[见图 1、11、12、13],后来,他赞赏的是夏洛特的蚀版画《战争的苦难》,多雷为《疯狂的罗兰》和《堂吉诃德》所作的插图和加尼耶为拉伯雷的《巨人传》所作的插图[见图 15、16]。在成年后,他收集和展示了似乎对他来说很重要的雕版图画,如位于罗马广场上和位于阿布·辛拜勒的拉美西斯二世像。

《弗洛伊德的美学》对西格蒙特·弗洛伊德的一些理论,特别是对这些理论在对理解艺术与艺术家时的影响方面,作出了说明;但是,本书也发展出一种立场,即弗洛伊德作为一个人的一生作品可被视为“伟大自白的断片”(歌德《诗与真》)。这一“自白”构成了他的第一部最伟大的自传性作品《梦的解析》(又译《释梦》、《梦的释义》)的核心部分;^②直到他的生命的最后,他也时刻专注于自我分析,并且这种分析不断得到修正和提炼。他在《梦的解析》中所分析的凝缩与移置概念,以及梦运作的核心机制,为弗洛伊德后来的作品提供了基础,并为他从心理玄学偏离到文学与人类学提供了刺激。在《图腾与禁忌》(1912~1913年)中,他设想俄狄浦斯情结是普遍适用的,他写道:“歇斯底里是艺术创造

^① 社会改革家章士钊,一位在 1949 年革命前后都从事着重要职业的知识分子,是唯一的一位与弗洛伊德通过信的中国学者(有一封信上注明的日期是 1929 年 5 月 27 日)。

^② 在 1931 年出版的英语第三版前言中,弗洛伊德写道:“它包含着,甚至按照我今天的判断,由于我的幸运而作出的种种发现中最有价值的发现。”

的拙劣的模仿。”

在《笑话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1905)一书中,弗洛伊德提出,他所感觉到的东西也许会为一种新的美学方法提供基础,即他的“意念模拟”(Vorstellungsmimik,这实际上与传统的模仿理论有联系)。^①他发现,呈现在我们对运动的知觉中的是一种模仿的冲动,以及形成一种“神经冲动能量”的量的再现;因此,在观看一个特别笨拙的个体时,我(通过精神的模拟)来配置那种能量,同时,我也意识到我采取一个类似的行动时,所需要花费的能力要少得多(“某种大的事物比小的事物要求更多的消耗”)。如果不能通向别处,能量的差异就在笑之中被消耗了。从儿童或未受教育人的手势的例子中,弗洛伊德推断出一种“模拟的需要”,而这本来可能会形成一种“为着交流目的而进行的模拟”的观点。

在最后一章中,他强调说:“我相信如果对意念模拟作深入研究,也许,就像它在这里对理解喜剧性有效一样,可有益于美学其他分支的研究。”这一观念似乎在他对艺术的论述中悄然出现了,在这里,他虽没有明确提到,但的确使用了模拟手势的理论:考古学者哈诺德所幻想的格拉迪瓦的富有煽情性的步态,列奥纳多笔下女性的谜一样的微笑,米开朗基罗对摩西的手臂和躯体的运动的展示,以及莫里茨·冯·施温德的《一个囚徒的梦》[图 28],在这幅图中,正如弗洛伊德所指出的,囚徒躺在牢房里,将自己的欲望投射成一连串的意象,“模拟”他通过窗户逃走的步骤。

弗洛伊德的笑话理论由犹太式幽默为主导,缺乏任何社会批

^① 我在论弗洛伊德的这本著作的第一版(1972年)中讨论了这一点,后来,在“弗洛伊德与现代艺术:对象、移情与意念模拟”中又谈到了这些,见《心理分析与当代思想》,第22卷,1999年秋,第4期,第575~589页。

判或政治颠覆性。这种幽默微妙而具有自嘲性,带着一种受到贬损的社会群体的特点。幽默不管是以讽刺还是以漫画的形式,都可以指向一种非正义。因此,幽默可以成为一种政治批评的载体,有利于在面对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体制时保持一种自尊心。传统的中国幽默家,通常是道家的享乐主义者,一般说来是一些退隐的官员与学者,他们的出世态度和经济上的独立使他们能够享受幽默。他们特别喜欢描绘自己生活中的微小的快乐与失意,从而触及生活的直接本质。^①弗洛伊德所分析的犹太幽默所具有的缺乏颠覆性意图的特点与中国幽默相似。幽默来源于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民族主义的功效性和制定秩序的目标使弱者感到羞愧,受到嘲笑,使释放性幽默受到控制;与此相反的是一个民族受外族压迫却保持一种不可征服的自尊心和恢复能力并借此激发了一种有节制的幽默和讽刺性自嘲形式,这种幽默强调品德与教养,这也是儒家传统的特征。

1907年,弗洛伊德对威廉·詹森的小说《格拉迪瓦》(1903)作了长篇分析,通过他的考古学的隐喻对无意识进行了研究。这部小说的故事“主人公”是一幅雕塑[图7]。这个故事是皮格马利翁主题的一个例子,在其中爱或欲望使石头变得有血有肉了。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性格内向的年轻考古学家罗伯特·哈诺德迷上了一幅古代浮雕,浮雕上刻的是一个迈步向前走的女人。哈诺德自己有一件这个浮雕的石膏复制品。他特别迷恋浮雕上女人仿佛是军队行进一样的步态,因此将之称为“格拉迪瓦”(来自古罗马神话中的战神马尔斯·格拉迪乌斯)。弗洛伊德描绘了罗帕斯

^① 夏志清:《中国人的幽默感》,香港,《译文》杂志,第9期,1978年。

的《圣安东尼的诱惑》中所表现出的欲望的不可抑制[图 8]:圣安东尼将《圣经》中关于约瑟节欲的文本打开,向十字架上的基督祈祷,以求得力量抵御性诱惑;然而,正是在他的眼中,欲望赶走了基督,而在十字架上原本是基督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位具有诱惑力的裸体女郎。

《梦的解析》中自我探索与客观兴趣的天衣无缝的结合,扩展到他两位重要艺术家的研究之上,这两位艺术家的作品都激发了个人的反思。弗洛伊德的“jeu d'esprit(巧智的游戏)”《列奥纳多·达·芬奇与他童年的回忆》(1910)将蒙娜丽莎和圣母玛丽亚的微笑与作者幼年时缺乏母爱联系起来[见图 9、10]。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列奥纳多努力避免“自动模仿”,认为它自相矛盾。与此相反,弗洛伊德却赋予古老的托斯卡纳谚语“所有的画家都在画自己”一种心理学的层面。他对列奥纳多的分析扩展到艺术家的个人性质(双性恋、左撇子、反暴力,以及他的“两个母亲”);但是,这也向弗洛伊德提供了研究埃及的象形文字、作为生殖崇拜对象的始祖母亲、婴儿的性敏感等具有丰富的个人意味的主题的机会。他对列奥纳多关于嘴被兀鹰的尾巴所击打的“回忆”的思考,可能会与埃及人兀鹰—母亲—女神联系在一起。^①米开朗基罗的《摩西》的姿态[图 14]像《蒙娜丽莎》一样,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激情反应,当时,他与他的一些学生在倾向上有着某种竞争关系。为了说明[摩西]持法版的不稳定状态,他依据施温德的梦的情景

^① 他关于生殖崇拜式的“列奥纳多的兀鹰—母亲”的思想可能来源于他童年时看到的菲利普森《圣经》中的埃及神像的鹰头。在《梦的解析》中,他陈述他的一个焦虑的梦,把它们想象成“梦运作的心理学,梦的功能”。弗洛伊德对这一构造有着强烈的个人情结,甚至一些学者提供了证明,列奥纳多的鸟是鸢而不是秃鹰时,他也拒绝做任何修改。

设想这样一种情况：作品描述了摩西对“《圣经》上所写的人们”崇拜金牛感到一阵狂怒，从而使十诫板脱手。这些多样性的情节，就像俄狄浦斯故事中的血亲乱伦包含了叙事性含义一样。^①

在“梦运作”一章(第六章)中，弗洛伊德通过与书写类比而解释了“梦中的再现手段”：

“……梦成为无可否认存在着的梦思的各成分结合成以情境或过程形式存在的整体的方式而形成的陈述。它产生出同时性形式的逻辑联系；这种情况与画家(如拉斐尔)将所有的哲学或诗人结合进一幅画中，形成《雅典学园》这幅画相似。他们从未聚集在任何的大厅或任何的山顶之上，尽管从沉思的心灵上讲，他们构成了一个群体。

梦与这种方式的再现完全一致。每当两个因素显示是联结在一起时，它保证了其相应代表在梦思之中的特别密切的联系。这与我们的书写方式类似：to 表示两个字母拼写在

^① 像潘诺夫斯基这样的图像学家在进行分析时允许在一种叙述因素出现在文艺复兴绘画的纯粹视觉成分之中。对再现自然所作的技术上的改进，使后来的艺术家可以从中世纪艺术的小“神龛”(tituli)的水平上向前发展。当然，对圣经故事进行解释的文本从中世纪以后德国《穷人的圣经》(Biblia Pauperum)传统延续到通俗法文的《圣苏尔皮斯图画》(imageries de Saint-Sulpice)以及从18世纪起的卡通文本之中，据我看来，我们可以用口语的丰富与文字的繁难的对比来解释中国文人画中叙事性较少而民间画中却存在着大量的叙事性的原因。近年来，出现了一种研究兴趣从文人画向更为通俗的“叙事性绘画”转移的倾向，这其中无疑包含着一些“滑稽艺术”。正像与之有着密切关系的木刻画一样，滑稽艺术可以追溯其久远的历史。以卡通式的插图来叙述故事的传统至少可以追溯到汉朝，在许多世纪里，中国的儿童都在读着有画的书。一些著名的明清小说也有连环画供中国儿童阅读。与文人注重于书写不同，中国艺术家创作了大量而多样的绘画。参见朱丽娅·K. 默里《什么是“中国叙事插图”？》，收入到《艺术通报》1998年12月号，第602~615页。亦参见田中秀道《乔托与蒙古和中国绘画对他的艺术的影响——圣方济各传说与帕多瓦阿雷那教堂壁画的分析》，载《艺术史》，日本东北大学：1984年第6期。涉及对一定历史时期的“政治无意识”所作的后弗洛伊德的说明，请参见林恩·亨特《法国革命的家庭罗曼司》，伯克利：1992年。

一起,其读音是一个音节,而 t 和 o 这两个字母在书写时如果中间空一格,那么,就表示 t 是一个词的最后一个字母,而 o 是另一个词的第一个字母。”

这一段引自弗洛伊德著作的话,像其他许多例证一样,说明不管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语词,都对他具有深刻的意义。

2. 语言问题:文化与翻译的心理分析

弗洛伊德将心理分析称为“谈话治疗”,并且,在医疗实践中,他常常从“口误”中追寻隐藏的动机。这种语言学的问题,构成了他的《梦的解析》的主要组成部分,即阐释梦的内容的困难在于展现在凝缩与移置之中的无意识的干扰。不管是方言,还是个人习语,都可能扭曲病人与分析者之间的情感转移关系。此外,正像在“翻译即背叛”(traduttore traditore)这句谚语中所批评的那样,将德语文本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可能会造成意义的稀释和混乱。在“梦的解析方法”一章中,弗洛伊德说,“梦从规则上讲是不可以翻译成其他语言的”;并且,在“初始语词的对立意义”(1910)中他谨慎地说,“如果我们对关于语言的发展了解得更多的话,我们应对梦有着更好的理解,翻译起来也就更容易”。但恰恰是由于汉字的歧义和丰富性,造成了翻译上的困难,尤其是在将西方的名称翻译成中文时就更是如此。^① 其他的误解则是由东方的心灵与西方的个人主义及自然主义在宇宙哲学上的差异造成的。这导

^① 符号学与拉康版的心理分析使语言学问题与后现代关于主体的理论相呼应,这可能会对将弗洛伊德的思想翻译介绍给像中国文化这样一个陌生的语境产生很大的影响。更进一步说,在女性主义、同性恋研究的影响下,出现了一种方向上的调整,注意力从家族中心的俄狄浦斯三角和阴茎崇拜,转向了怪异和记忆屏蔽这样一些话题之上。

致了一种由性病理学和一种游戏的治疗法所支配的心理学；因此而用健康与神经症来对艺术家与非艺术家进行同等考察。其中的一个最为著名的例子是，圣特雷莎的迷狂从 19 世纪起就被怀疑论者讽刺地解释为不是精神的迷狂，或与宇宙的融合，而是一种性兴奋。西方的（基督教的）对性欲的压抑，对身体的拒绝，以及（弗洛伊德以及其他）人所导致的神神经症和有罪感的治疗，与中国人对性欲的深层次的接受是不一样的。无可否认的是，为中国受教育阶层服务的情色艺术是精妙而不直白地受着一种关于道的哲学的影响，赞同“一阴一阳谓之道”，并认为“阴阳合而万物生”。

弗洛伊德在其职业生涯的一开始研究的是一个“科学心理学的课题”。通过他多年的临床经验，发展出心理玄学和语言学的技巧。他寻求通过分析以自由联想的方式，运用一种字源学的工具，实施一种“语言的考古学”，将被压抑的内容找出来。他相信，通过语言发展的研究，可使他找到神经症的情感的历史。他显然遵循了这样一个公式：语源学=病源学，这与 19 世纪的那种本体论是发生史的概述的思想有着呼应的关系。但是，他对古代艺术和神话的研究是与图像的肖像学分析[图 22]，或者是与比较语文学相类似的。这些做法探究了印欧语系的古典语言的当代用法与思想，提出了一种个人与文化发展间的类比关系。

将弗洛伊德分析梦文本的方法论译成汉语并不容易。汉语方言间的区别比整个欧洲方言间的区别还要大得多，但它标准形式的书写，与口头的通俗语言相比，进化得要缓慢得多。尽管只有松散的联系，汉语的书写显然来源于口语：学术界一般认为，汉语具有巨大但不精确的音节，它们具有视觉与语义的性质，但是，